・新聞學研究・　第一二三期
2015 年 4 月　頁 45-90　研究論文

# 民國報業的壟斷問題
## 成舍我的思考與反省

黃順星*

投稿日期：103 年 8 月 19 日；通過日期：103 年 11 月 7 日。

* 黃順星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助理研究員，e-mail: t197266@ms4.hinet.net。

# 《摘要》

媒體壟斷已是當前討論傳媒發展時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實際上當前的媒體壟斷並非新現象。1930 年代無論中國或英美，報業托拉斯與壟斷問題已為時人所關注。自壟斷資本主義出現後，商品化趨勢便蔓延到傳播活動中，新傳播科技不斷施用於組織化的傳播過程，都加深傳播商品化與媒體壟斷的現象。換言之，壟斷是傳播商品化的必然過程，但這段歷史經驗卻為人所忽視。本文藉分析民國知名報人成舍我對當時中外報業的觀察與批評，乃至提出「成舍我方案」化解現代報業所存在資本化與公共化的兩難困境，作為思考當前討論媒體壟斷時的另類思考方向。

關鍵詞：公共化、民國報業、成舍我、媒體壟斷

## 壹、壟斷的歷史

現代新聞事業引入中國是相對晚近的歷史事件，不少學者試圖從中國的歷史脈絡，擷取不同的文化資源賦予本土意涵。但從新聞作為產業的面向而言，中國新聞事業的經營、管理與發展始終深受英美報業先進國的影響。這從事關新聞人才培育的專業教育體制的移植、新聞編採實作的仿效，到諸多報人有意識地以西方報人為學習典範，都可發現英美報業對民國報業的深刻影響。

1928 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報業生態丕變。短暫統一形成穩定的政治局勢，加上資本主義經營方式與新技術的引入，這時的報業遠較北洋時期呈現更蓬勃的發展榮景（MacKinnon, 1997）。de Burgh（2003）即認為，儘管此時仍有報紙從政黨獲得經濟支援方得出版，但透過商業化為手段，以「營利性」立足於市場，成為 1930 年代民國報業發展榮景的結構條件。曾虛白（1989）因而將這段持續到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的十年，稱為中國報業發展的黃金時期。

但在繁榮發展的背後，隱藏鮮為研究者關注的負面影響：此時的民國報業與英美報業相同，都出現報業托拉斯的市場壟斷問題。報業壟斷肇因於傳播革命所導致的技術變革，於是經營者必須耗費鉅資添購生產設備，進而提高進入報業市場的資本需求。報業揚棄過去仰賴訂戶零售為主要收入的獲利模式，與廣告商攜手將新聞打造為商品化的資訊產品。新聞乃至現代傳媒產業在生產結構與生產方式上產生鉅變，不但新聞事業就此開啟商品化與資本化的歷程，媒體壟斷也成為迄今不斷被關注的議題。

換言之，當下台灣乃至各國所關注的媒體壟斷，並非全然的新現

象，而是歷史進程中傳播商品化的必然過程。自壟斷資本主義出現後，社會整體的商品化趨勢便滲透蔓延到傳播活動中，推陳出新的傳播技術不斷被施用於組織化的傳播過程，都一再加深商品化與壟斷的現象（Baran & Sweezy, 1968; Compaine & Gomery, 2000）。但民國時期的報業壟斷問題，卻為研究者所忽略。本文藉民國知名報人成舍我對中外報業的觀察與反省為起點，探討 1930 年代中國與英美報業的壟斷問題，並分析成舍我所提供的解決方案，以及對當前媒體壟斷現象的反思。

成舍我於 1924 年創辦第一份報紙：《世界晚報》，更於 1930 年代衍生為同時於北京、上海兩地發行的連鎖報業體系，於上海發行的《立報》更曾創下戰前中國報紙的最高銷售紀錄（20 萬份）。論者因此多以報業托拉斯（方漢奇，1996）、深諳印刷資本主義之道的現代報人（Chin, 2013）、或成功的企業化經營者（吳廷俊、沈靜，2014）視之。此論不但忽視報業托拉斯對報業發展的不利影響，也難以解釋成舍我在許多文章中對報業資本化與壟斷的批評。

另一種解釋途徑則從思想資源、意識型態的角度分析成舍我的辦報理念，以此解釋成舍我的報業實踐，如：張育仁（2002）將成舍我視為受自由主義影響的報人；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2010）從無政府主義的角度，析論成舍我「報紙大眾化」主張的思想根源；唐海江（2013）以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間的辯證，詮釋成舍我自由報刊理念的形成。

這些解釋皆有獨到之處，各成一家之言，但成舍我畢竟不是思想家，多數文章為應付報紙日常刊印之用，罕見具體闡述個人思想的系統性論述；加上史料的匱乏（1949 年前的書信日記已散佚），對行為的不同詮釋更難有定論：如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2010）認為成舍我所以將報刊名稱定為「世界」，是受無政府主義影響之故；但唐海江

（2013）卻認為此乃五四時期世界主義之遺緒。成露茜等人極為重視的「報紙大眾化」主張，也非成舍我獨創，民國時期諸多報人與學者都曾作此主張（黃天鵬，1930）。

本文認為，成舍我獨特之處在從報紙經營者的角度，對影響報業發展的各因素皆有敏銳的觀察與識見，卻不因此限制其對營造真實反映民意報業環境的公共關懷。分析成舍我對中外報業的評述，不但可以瞭解當時各國報業資本化與壟斷的狀況，也能掌握產業化對報紙發展的影響。藉由成舍我對資本化問題的批判，及其提出化解資本化與公共化兩難的「成舍我方案」，更可為當前台灣的傳媒現狀提供另類思考方向。

以下首先探討自民初即踏入報業的成舍我如何看待當時的報業環境，又如何從落後的文人辦報，借助西方報業的發展經驗而轉向繁榮發展的黃金年代。其次以英美報業的產業化歷程說明現代報業所引致的弊病，並以中國此時出現的報業壟斷事件證明起步雖晚，但民國報業也與英美報業同樣面臨因壟斷而滋生的諸多問題。接著以成舍我西遊時對英國報業的考察文章，說明成舍我如何截長補短汲取西方報業的經驗，進而針對中國的狀況提出獨特的報業發展規劃。

## 貳、文人辦報的式微

1973 年 2 月 8 日，成舍我應台灣《新生報》之邀，於該社演講報人經驗：

> 我在民國元年開始當記者，那時是 15 歲……。在過去 60 年中，大部分時間，停滯在文人辦報時期，現在的報紙，卻已經進入了商業化和工業化。過去我所經歷的那一套，已是太陳舊、太落伍了（成舍我，1973，頁 1）。

演講結束前，成舍我（1973，頁 4）再次強調：「在文人辦報時期，這些經歷，也許有時可供參考，當報紙已整個資本化、企業化的今天，則只能當做談故事、說平話，沒有任何價值。」舉重若輕的談話，傳達報業鉅子對民國報業史的獨特見解。

在中國新聞史研究中，文人辦報與文人論政時常交相使用，並且往往指涉民國時期知識份子從事新聞事業時獨具的精神態度。例如，張季鸞（1979，頁 582）在〈本報同仁聲明〉中就說：「中國報原則上是文人論政的機關，不是實業機關。」同樣由張季鸞起草的〈中國新聞學會成立宣言〉仍然強調：「我國報業之有與各國不同者，蓋大抵為文人發表政見而設，不為商業之經營，此種風氣今猶遺存。」（轉引自曹立新，2012a，頁 245）這種深受傳統中國士人遺風影響的報刊精神，向為研究者所推崇（賴光臨，1980；方漢奇，2004；李金銓，2004）。早在梁啟超於 1896 年發表的〈論報館有益於國事〉一文中，就已提醒國人注意學校、學會與報紙的重要性。但重視報紙、推崇文人辦報，是經過漫長的歷史演變，社會對文人從事報業方生好感。

具體而言，傳統中國士人因科舉制度的施行，在地方鄉里乃至中樞朝政皆保有一定的社會與文化特權。但 1905 年取消科舉後，這種制度性的保障也隨之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由新式學堂、社團與報刊等公共網絡構成的「知識人社會」：「這一『知識人社會』居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其中的角色不再是傳統士紳，而是現代知識份子，其職業是多元的：教師、編輯、記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許紀霖，2008，頁 7）由於傳統士人具有操持文字符號的特殊能力，於是新式學堂與現代報刊成為傳統士人的棲身之所。當中有人援引比附，將現代報刊視為古代清議，透過現代報刊影響國政、形成輿論中心，形成後人稱頌的文人辦報傳統；但也有人因為現代報刊的商業營利特質，而放棄中

國士人的倫理包袱，以迥異於傳統的方式經營其文化生涯（黃順星，2009，頁 303）。

成舍我早年的辦報生涯，即反映此一轉變時期中國文人的曖昧身分與多重選擇。就投身文筆政治、獻身啟蒙事業而言，成舍我幼年因父親遭人誣陷，求助於記者而獲平反，故萌生對新聞工作之嚮往；就讀北大時於《益世報》兼任編輯，因批評安福系軍閥迫使《益世報》停刊三天；《世界日報》登載邵飄萍、林白水槍決新聞，成舍我雖險遭不測但仍持續經營報業；南京《民生報》遭汪精衛查封停刊後，隨即於隔年在上海創辦「立己、立人、立國」的大眾化報紙《立報》。凡此種種，皆可看出辦報之於成舍我有著啟迪國民、救亡圖存的士人承擔。

另一方面，成舍我青年時因參與二次革命而遭緝捕，避走上海時與王新命、劉半農等人合組「賣文公司」，以撰稿、翻譯謀生；就讀北大時除兼任《益世報》編輯，也與北大同學共同募資 5 千餘元，成立以翻譯出版外文書籍為主的「北京大學新知書社」。及至日後陸續創辦《世界日報》、《民生報》與《立報》，皆以經營成效卓著而廣為人知。賣文為生之於成舍我，固然出自現實生活之困頓而不得不然，但也無重利輕義的不適應與愧咎。

成露茜等人（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2010），因此追溯成舍我北大求學時的社團經歷、人際網絡，並考察思想環境後主張，成舍我倡導手腦並用的工讀教育、打破勞心、勞力的對立、強調「非資本主義化的大眾化」報紙等主張，無一不與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立場相近。以此反駁將成舍我上述措施，簡單化約為剝削勞工、積累資本的批評。但也由於無第一手資料可證實成舍我的辦報理念，因此也替其他研究者以不同的意識型態與黨派立場詮釋成舍我的報業實踐留下空間。[1]

成舍我於中國新聞史中難以定位的模糊曖昧，說明的是在中國正逐

漸成熟的文化市場中，增生大量「新式文化人」的現象。李仁淵（2005，頁 91）借用熊月之對「新式文化人」的分析指出，新式文化人的特徵是其所賴以為生的本錢為「知識」。新式文化人將過去用以轉換為政治、社會資本的文化資源（知識），轉化為經濟報酬。新式文化人從事文化事業的目的與動機，自然人言人殊，並在此一新生的文化市場中各自找尋定位與認同。

李金銓（2004）以「儒家自由主義」形容受中國士人文化影響的文人辦報傳統，並以此比較受專業主義影響下的西方新聞實踐間之異同。就言論自主性而言，西方專業主義相信經濟獨立才是擺脫黨派勢力影響的自主性基礎；文人辦報則相信言論的獨立來自知識份子的良心。就角色認定而言，西方專業主義以專業人士自詡並與讀者受眾平等；文人辦報，則自視為啟蒙大眾的文化菁英，以指導影響輿論為期許。若將李金銓的分類視為理念型，成舍我的辦報實踐以及對報業的觀察反省，顯然難以擺置在任何一方，而是處在兩極端的中間地帶。深入分析成舍我前引 1973 年演講的內容，就可發現成舍我不是以從業者的精神態度定義文人辦報，而是從產業發展的階段界定何謂文人辦報：

> 我 15 歲當記者，是從校對工作幹起，26 歲以前……，那正是文人辦報時期……。文人辦報時期，既然沒有大資本，人事方面自然也極其精簡，一個人要做幾個人的工作，以《世界晚報》來說……，總共就只有三個人（成舍我，1973，頁 2）。

1924 年成舍我 26 歲，以僅有的 200 元創辦《世界晚報》，往後此事一直為人稱道，盛讚成舍我堅持獨立、不收津貼，以獨立報人身分經營報紙而卓然有成。成舍我也如報界前輩王新命、葉楚傖等人相仿，常以典當應付報紙出刊之所需。當張恨水的小說《春名外史》於《世界晚

報》連載造成轟動，《世界晚報》的訂戶、零售與廣告等收入始有穩定成長，並得以於隔年（1925 年 2 月）創辦《世界日報》。但證諸時人記載，民初以相近資金投入報業之人，所在多有：

> 多數報紙，既無機器以印刷，又無訪員之報告，斗室一間，即該報之全部機關，編輯、僕役各一人，即該報之全體職員。印刷則托之印字局（以每日 1 千份計，每月之印刷費，一大張約需 150 元，兩大張約需 200 餘元）。由此觀之，凡具數百元之資本，即可創設報館，無怪報紙日出日多也（熊少豪，1922／1986，頁 434）。

民國成立後出現大量以低廉資本設立的報紙，原因之一在於各政治勢力需要刊物為其喉舌；另一原因是少數人士以辦報之名，行陰私勒索之舉：

> 軍閥時代，軍人，政客，以辦機關報，或津貼報館，為安插低能親友，或攏絡無賴文氓之唯一方法。又如上海租界，社會罪惡極多，流氓趁機，遂恆以創辦小報，揭發陰私，為敲詐發財之大道（成舍我，1943／2013，頁 223）。

為特定政治勢力服務，以文章恐嚇社會名流，以及因人而異的新聞檢查，不但成為民初報業無法充分發展的原因，也是新聞從業者社會聲望低下的主因。

在 1928 至 1937 年中國報業黃金年代到來前，中國報業就是由這些文人以極低成本創設，或接受津貼而不受市場邏輯控制的政論報刊為主流。這些政論報的特徵有二：「一是執筆者大都懷著憂慮國家之心，二是多數報紙都是以捐款創辦，非以謀利為目的。政論報紙的評價標準並不是報紙新聞的數量與質量，也不是報紙廣告的收入與效果，而是以言論取勝。」（王潤澤，2010，頁 125-126）舉凡主張維新變法的康有

為、梁啟超、力主革命共和的于右任、章太炎，都屬於政論報傳統下的知名報人。

在 1924 年 4 月成舍我創辦《世界晚報》前，北京僅有一份《北京晚報》。內容上，《北京晚報》以剪貼前一天北京各日報要聞匯集而成，而當時北京各日報多由不同的政治勢力所支持，新聞、言論極易受影響。因此強調不炒冷飯（不抄襲前日新聞）、比日報搶先刊登消息（刊載當日新聞）、全年無休的《世界晚報》，得以在北京報業異軍突起（馬之驌，1986，頁 154）。[2] 這些如今已成為新聞工作者常識的革新，卻是《世界晚報》得以勝出的關鍵。從《世界晚報》以「新聞」為賣點而獲致成功一事，正可說明民初報業從著重言論的政論報、文人辦報傳統，逐漸轉向重視新聞的變化。這也和英美報業在 19 世紀後半，因生產方式轉變，由基進報、黨派報轉向商業化大眾報紙的潮流一致（Schudson, 1978）。

在英美報業發展歷史中，也曾出現強調意見言論而非新聞的黨派報階段。19 世紀上半葉英美乃至西方新聞事業的公共責任不在探索真實，著重的是立場各異的作者彼此筆鋒間的爭辯，評斷新聞事業優劣的是評論而非新聞。無論是英國的基進報刊或美國的黨派報紙，新聞從業人員的身分認同是政論家（publicist）而非記者（journalist），他們從不標榜客觀公正的立場，更清楚表達說服大眾接受一己之主張的政治意圖（Schudson, 2003）。

但至 19 世紀中後期，依靠有限資金與人力而興盛的基進黨派報刊，因為新聞產業基礎產生變化而傾頹。這是因為交通運輸及印刷技術等基礎設施的精進，使報業具有大量生產的潛力，並朝規模經濟的方向發展。加上英美兩國的普及教育，個人可支配所得增加，以及因縮短工時而衍生的休閒時間，都擴大讀者對報紙的需求。從事報業不再是對政

治有強烈企圖之人，代之以普立茲（Joseph Pulitzer）、赫斯特（William R. Hearst）、北巖爵士（Lord Northcliffe）等以報業謀利的資本家為主。19 世紀後期英美報業的現代化，是在工業化、資本化與集中化等因素互動下，將報業塑造為今日世人所熟悉的運作模式（Chalaby, 1998, p. 41）。

就工業化對報業的影響而言，反映在先進傳播技術對報紙在新聞編採與發行層面上的改進。從 1814 年倫敦《泰晤士報》（*The Times*）採用蒸汽印刷機，到 1860 至 1870 年間英國報紙大量採用輪轉印刷機，都使報業生產力大幅提昇，得以在短時間內印製大量報紙以供銷售而增加獲利。1866 年橫跨英美的大西洋電纜完成，以及電報、電話、打字機等生產設備普及化，不但成為新聞工作者的必要工具，也改變新聞工作的速度與節奏，更轉變報紙的性質。報紙的首要功能是報導「即時」新聞，不再是評論與分析。藉由新傳播技術，記者不但得以立即報導，新聞查證與新聞國際化才成為可能，也逐漸確立專業新聞的樣貌。

此後報業經營者就必須不斷添購設備，引進更先進的技術於報紙生產與新聞編採工作中，方能促使報紙提供可資信賴的新聞予讀者。如此，導致報紙生產成本增加，投入報業的資本門檻也不斷提高（Conboy, 2004, p. 166）。如 1876 年 *Daily Chronicle* 以 3 萬英鎊轉手經營，接手經營者又投資 15 萬英鎊；影響英國當代大眾報紙極深的 George Newnes，在成功創辦 *Tit-Bits Magazine* 後，於 1893 年以 10 萬英鎊購入 *Westminster Gazette*，但往後 15 年間每年至少投入 1 萬英鎊於 *Westminster Gazette* 的經營行銷上。一份報紙要達到損益平衡的難度是越來越高，報業不但成為資本化的產業，也成為高度集中化的壟斷市場（Chalaby, 1998, p. 44）。

壟斷與集中化最顯著的後果，就是獨立商人的重要性降低

（Sweezy, 1970）。反映在報業市場上，就是原先數量龐大的地方報、小型報因生存不易，逐漸為連鎖報團侵吞。表 1 是英國全國性報紙數量的統計，從表中可看出 30 年間日報數量減少 38%。表 2 是不同年代裡，在英國創設一份報紙所需資金的推估，半世紀裡進入報業的資金門檻激增 20 倍。北巖爵士在 1896 年創辦《每日郵報》（*Daily Mail*）時，機器、廠房、辦公室與其他基本設施就需 50 萬英鎊（不含薪資）。到 Lord Beaverbrook 於 1912 年創辦 *Sunday Express* 時，在損益平衡前就已經投資超過 200 萬英鎊（Curran & Seaton, 1997／魏玓、劉昌德譯，2001，頁 52-54）。

**表 1：20 世紀初英國全國性日報數量**

| 年代 | 報紙數量 |
|---|---|
| 1900 | 172 |
| 1921 | 124 |
| 1926 | 112 |
| 1931 | 106 |

資料來源：整理自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pp. 44-46), by J. K. Chalaby, 1998, London, UK: Macmillian.

**表 2：英國成立新報所需資金**

| 年代 | 所需資金 |
|---|---|
| 1850 | 25,000 英鎊 |
| 1870 | 100,000 英鎊 |
| 1900 | 500,000 英鎊 |

資料來源：整理自 *The origin of the popular press 1855-1914* (pp. 76-103), by A. J. Lee, 1976, London, UK: Croom Helm.

## 參、上海報業的壟斷

以上所論主要是英國報業的經驗，20 世紀初的中國報業方才起步，缺乏可靠的統計數字難以掌握實際狀況。但文人辦報必須面對市場壓力，可從時人的隻字片語略知一二。例如梁啟超以文章政論轟動朝野，但投身於報紙出版事業時也非一帆風順。主辦的「廣智書局」嚴重虧損，《新民叢報》由盈轉虧，籌辦的漢口《江漢公報》則花費鉅款後而中止。梁啟超因而感嘆：「吾儕皆書生，於持籌握算之事，一無所知，以營商務，小事則小敗，大事則大敗耳。近年非不嘗謀此，而屢試屢蹶，故令頗憚之。」（蘇精，2000，頁 289-290）

初生之犢無所畏的成舍我，憑著副刊與即時的新聞，讓《世界晚報》快速崛起，並在 10 個月後另行創辦《世界日報》。此時成舍我已能以報社名義向銀行貸款籌辦新報，所貸款項購入兩部對開印刷機，同時刊印日報與晚報。更於 1928 年 10 月國民政府北伐行將成功之際，赴南京新辦《民生報》。同年因《大公報》更新設備，《世界日報》以 8,000 元購入《大公報》淘汰之輪轉印刷機，取代每小時僅可印製 1,000 張的對開印刷機。但原有報社廠房無法安置龐大的輪轉印刷機，成舍我又以 5 萬元購入原有大小客房 60 間的「華北飯店」，改裝為《世界日、晚報》的社址與員工宿舍（馬之驌，1986，頁 169）。

此時成舍我已躍然而為成功報人，但與同時代其他報人相比，成舍我所掌握的報業市場是有限的。表 3 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於 1932 年 8 月統計當時中國主要報紙的發行量，《世界日報》即便於所在地北平的發行量亦非當地最大。單就發行量而言，上海一地所發行的報紙，更佔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此時《申報》與《新聞報》這兩份當時中國發行量

最大的民營報紙，出現引人注目的併購事件。

**表 3：1932 年中國主要報紙發行量**

| 報紙 | 發行量 | 報紙 | 發行量 | 報紙 | 發行量 |
|---|---|---|---|---|---|
| 上海《申報》 | 150,000 | 廣州《民國日報》 | 15,000 | 北平《北平晨報》 | 7,000 |
| 上海《新聞報》 | 150,000 | 天津《庸報》 | 15,000 | 天津《華北新聞》 | 7,000 |
| 上海《時事新報》 | 50,000 | 廣州《大中華報》 | 12,000 | 廣州《現象報》 | 7,000 |
| 上海《時報》 | 35,000 | 廣州《七十二行報》 | 10,000 | 漢口《武漢日報》 | 7,000 |
| 天津《益世報》 | 35,000 | 北平《益世報》 | 9,000 | 漢口《漢口中西報》 | 7,000 |
| 天津《大公報》 | 35,000 | 上海《中國晚報》 | 9,000 | 廣州《越華報》 | 7,000 |
| 天津《午報》 | 25,000 | 天津《新報》 | 9,000 | 北平《華北日報》 | 6,000 |
| 廣州《公評報》 | 20,000 | 北平《商業日報》 | 8,700 | 廣州《共和報》 | 5,000 |
| 上海《民國日報》 | 20,000 | 北平《世界日報》 | 8,500 | 杭州《民國日報》 | 5,000 |
| 廣州《國華報》 | 16,000 | 北平《全民報》 | 8,000 | 開封《河南民報》 | 5,000 |
| 南京《中央日報》 | 15,000 | 北平《京報》 | 7,300 | | |

資料來源：《七十年中國報業史》（頁 95-97），賴光臨，1981，台北：中央日報社。

上海《申報》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於 1872 年創辦，1912 年由史量才以 12 萬元購入，接手時《申報》發行量為 7 千份，1922 年增至 5 萬份，1925 年上升為 10 萬份以上，1928 年更達 14 萬 3 千多份。同年與《時事新報》共組《申時電訊社》，陸續創設相關機構：申報流通圖書館、申報新聞函授學校與《申報月刊》等相關企業。至 1938 年，《申報》僅有形資產即累積到 150 萬元（馬光仁，2014，頁 549）。1921 年北巖爵士參訪《申報》後，更讚譽《申報》為中國的《泰晤士報》（宋軍，1996，頁 126）。

上海《新聞報》由英商丹福士於 1893 年創辦，1899 年由美籍人士福開森（John C. Ferguson）接辦，1914 年時銷量為 2 萬份，1915 年增加到 5 萬份，至 1926 年已有 14 萬份的發行量。1922 年時《新聞報》

的廣告收入已近百萬元，扣除董事分紅及各項開支，約有 10 萬元盈餘（馬光仁，2014，頁 553）。在《新聞報》聲勢鼎盛之際，1928 年福開森有意出脫手上所持《新聞報》65%的股份。《申報》負責人史量才聞訊，即透過董顯光與福開森秘密洽商收購股份事宜，最後以 70 萬元承購福開森所持股份，並於 1929 年 1 月簽署草約。

交易事件曝光後，引起《新聞報》經理人汪伯奇、汪仲韋兄弟不滿，率員工於《新聞報》頭版刊登廣告抗議收購行為：

> 《新》、《申》兩報是上海最大報紙，一向彼此對立，互相競爭。如果《新聞報》再落入史量才之手，他就可以一手操縱輿論，成為中國報業托拉斯，於國於民均屬有害無利（汪仲韋，1982，頁 142-143）。

汪氏兄弟並聯合上海商會及全國總商會，以商會名義在《新聞報》刊登廣告，聲言反對報業托拉斯。天津《大公報》更報導史量才的托拉斯壟斷計畫分為三步驟：1.設立所控制各報的聯合辦事處，聯合採訪、聯合調高廣告刊價；2.設立通訊社統一宣傳；3.以廉價方式提供外地各報專電，壟斷外地報紙所提供消息（宋軍，1996，頁 127）。

另一方面，由於國民黨覬覦《申報》與《新聞報》良久，多次向兩報傳達投資入股之意，但始終為兩報負責人婉拒。[3] 因此，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務指導委員會在《新聞報》上，以半個頭版刊登〈致《新聞報》公開信〉，認定此次股份收購行為乃反動份子所為，揚言需於兩週內收回股權，並警告若有違抗，將採嚴厲處置（馬光仁，2014，頁 688）。在國民黨的介入下，史量才被迫出脫 15%的持股，股權不致過半，並承諾《新聞報》人事制度不變、館內人員不動、也不另派人員入館，與員工及國民黨取得妥協，事件得以告終。[4]

在《申報》收購《新聞報》股權風波之後，並未阻斷其他人藉由壟

斷提高營收的企圖。若說《大公報》對史量才成為報業托拉斯的三步驟，純屬謠言揣測，1935 年被迫讓出「四社」股份與經營權的張竹平，無疑坐實壟斷報業市場的罪名。所謂「四社」是 1932 年，由張竹平經營的《時事新報》、《大陸報》、《大晚報》與《申時電訊社》組成聯合辦事處的簡稱。[5] 張竹平原為《申報》經理兼營業主任，於 1924 年結合《申報》與《時事新報》同仁，合辦《申時電訊社》。原由張東蓀創辦的《時事新報》，因經營狀況不佳，於 1928 年轉售給張竹平、汪英賓、潘公弼等人。《大陸報》是由孫中山、伍廷芳等人出資，於美國註冊登記的英文報紙，之後轉售給英商，也因經營不善，於 1930 年轉售給張竹平、董顯光。《大晚報》則是由張竹平，結合曾虛白等人所新辦的晚報（張玉法，1989，頁 369-370）。

透過逐步收購的方式，張竹平在上海報業市場建立起包含日報、晚報與外文報的水平整合，四社之間不但彼此交換新聞，在印刷與業務上也互通有無（黃瑚，2005，頁 200）。在中國 30 多處派有記者採訪的《申時電訊社》，不但提供三報豐沛的訊息管道，三報也將新聞透過《申時電訊社》提供海內外 100 多家簽約報社通訊稿件。但四社終因壟斷報業市場的狀況過於顯著，加上涉入 1933 年的閩變，自 1934 年起陸續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禁止上海租界以外地區郵寄發行《時事新報》。1935 年 5 月，張竹平以稱病為由辭去四社職務並由杜月笙暫代，後以 20 萬元售予孔祥熙（馬光仁，2014，頁 763）。

從史量才併購《新聞報》到張竹平創建四社，都可看到 1930 年代的中國報人，試圖將自身報紙擴張為報業托拉斯的嘗試。雖然最終皆被統治者以政治理由制止，但為追求現代化報業發展而導致資本化、集中化的現象，卻已為時人察覺：

> Sir Northcliffe 止以《泰晤士》之勢力，即稱為輿論之製造

> 者，其勢足以去留內閣，而顯其無冠帝王之威權，而成輿論執論之時代。此種托拉斯之趨勢，已由一地而至全城，由一城而至一省，由省而至全國，由歐洲而至美國，而渡海東來，在中國資本主義亦已侵入新聞界，其為利為害，觀乎英美各國之情形，自可瞭然（黃天鵬，1930，頁 161）。

黃天鵬的引述，明顯以前文所提北巖革命造成的負面影響為例，指出報業市場被壟斷後，報閥自視為無冕王，任憑己意、罔顧公益，操縱輿論的不當行為，但並未說明壟斷對整體報業的衝擊為何。對此，成舍我（1932／2013，頁 62）有更全面的觀察：

> 自從產業革命以後，報紙也同樣的受了蒸汽機和電氣的影響。報紙商業化，就一天一天擴大起來，從前那班文人，想以個人力量去辦報的，近百年來，在歐美幾乎絕不可能。中國現在，雖還有些文人用極少資本，憑個人文章和資望，去自行創辦報紙，然而這種報紙的成功希望，是一天比一天減少。在最近的將來就會要和歐美一樣，絕不可能了。我們看上海新興報紙之不能產生，就是一個極顯著的證明。這就因為現代的報紙，既然純粹商業化，他需要最新式的生產工具，就不能不需要最多的資本。一個赤手空拳的文人，如何能同那班坐擁巨金的資本家競爭，沒有法子，只好拱手讓人。

比較第二節成舍我於台灣《新生報》演講中所提文人辦報已成往事的論斷，在四十年前中國蓬勃發展的報業黃金年代中，成舍我早已察覺商業化的報業市場，已無法成為文人發聲倡議的工具。不只成舍我，曾任燕京大學新聞系主任的劉豁軒（1941，頁 9）也有相同的觀察：

> 每架十五萬元以上的高速度輪轉印報機器，在民十七以前，只上海《申》《新》《時》等報有四五架，民二十，天津

> 在一年內便裝置了兩架……。以前三五萬元，甚至三五千元便可以辦報：現在，如在津滬等地，新辦一個報起碼非一二百萬不可。不用說幾千幾萬，就是三十萬五十萬的資本，也等於是以卵擊石。所以民十七以來，津滬兩地很少新興的獨立經營的報紙。就是以黨或政府為背景的報，在這兩個地方也不能立足。

從這裡可以看到，報業為提昇產製效率以龐大資本購入高速印刷機，導致創設報紙資本門檻增加，造成新報不易出現，不以市場營利為目的的政黨報也難以競爭。這樣的問題不獨存在於英美報業先進國，脫離落後文人辦報進入蓬勃發展的民國報業，在 1930 年代也步上報業市場為托拉斯壟斷的浪潮。

## 肆、成舍我的西遊記

藉助資料整理可證實成舍我晚年所論：現代報業歷經資本化、工業化的衝擊，文人辦報已成往事的論斷並非無的放矢。文人辦報為商人辦報所取代的現象，在 1930 年代的中國即已出現，甚至放諸國際，若說報業壟斷為全球化現象也不為過。1930 年 4 月成舍我開啟近十個月的西遊考察中，因親蒞西方報業現場及歷史機遇的巧合，使成舍我更深刻體會報業壟斷造成的負面影響。尤其在〈在倫敦所見英國報界之新活動〉（成舍我，1930／2013，頁 15-33）一文中，可清楚看到成舍我如何以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為鏡，衍生為獨特的報業發展理念。

## 一、有權無責的報閥

這篇於 1930 年 10 月 27 日自倫敦郵寄回國的稿件中，記載四件事：「英國報界兩巨頭與最近政潮」、「帝國會議與報界」、「倫敦市長在廣告大會之演說」、「北巖爵士銅像落成」。在「帝國會議與報界」部分，記錄報業人士要求帝國會議調降電報費及減免廣告稅率。「報界兩巨頭與最近政潮」部分，記載同為保守黨員也是報閥的 Lord Rothermere 及 Lord Beaverbrook，與保守黨魁 Stanley Baldwin 因政見不和，退出保守黨另組政黨引起的政局動盪為主。雙方爭執點為保護主義的實行範圍：Lord Rothermere 與 Lord Beaverbrook 主張帝國境內無分彼此給予一致的優惠關稅，S. Baldwin 則主張有限度的保護主義。

爭執不下之際，適逢倫敦 Paddington 區補選，工黨、保守黨、兩位報閥所組政黨皆派人參選。Lord Rothermere 不但多次公開助選，兩位報閥也動用報紙為候選人宣傳，並大肆抨擊黨魁 S. Baldwin。10 月 27 日郵寄回國的稿件中，成舍我表達兩位報閥為實現個人政治意志，以報紙公器鼓動政潮的作風，深感不妥：

> 吾人專就新聞事業之立場而論，此種思想保守，出身貴族，坐擁巨資之報界巨頭，雖彼等自身宣稱，其挾報紙以控制政治，均出於公共福利之一念，即使確係事實，然可倖存於保守性質之英國者，而在民治潮流，日見發皇之今日，新聞事業，本代表多數國民，如彼等特殊階級之人物，決不足當領導平民的無產階級的新聞事業之任，愚尤不願未來的新興的中國新聞事業中，將有類此之人物出現（成舍我，1930／2013，頁 25）。

在成舍我發稿後舉行投票的 Paddington 區補選，最終由 Lord Beaverbrook 支持的候選人獲勝。稍後 East Islington 的選舉，保守黨候選人落至第三位，引起保守黨員對 S. Baldwin 的不信任。S. Baldwin 於是以 Westminster St. George's 選舉為賭注，將自由貿易的政策爭論，轉為對兩位報閥操縱輿論的批評。S. Baldwin 最終贏得選戰並保有黨魁職位，選後 S. Baldwin 對兩位報閥操縱輿論的行為，作出如下評論：「擁有這些報紙的目的就是權力，而且是有權無責的權。」（Curran & Seaton, 1997／魏玓、劉昌德譯，2001，頁 73-90）

## 二、資本巨靈的現形

英國報業所以在 1930 年代形成由少數報閥壟斷的局面，除了工業化使報紙能夠大量生產，廣告取代訂戶成為報紙主要收入，也是導致報業高度資本化與集中化的關鍵。北巖爵士《每日郵報》的成功與創新的廣告策略相關，《每日郵報》首先打破英國報紙頭版僅刊登分類廣告的傳統，是第一家刊登陳列廣告（display ad）的報紙。《每日郵報》並將發行數字刊登於報頭，不但吸引廣告商刊登，也以此決定廣告刊價。因此，廣告如何促進報業發展也是成舍我此行考察項目。「倫敦市長在廣告大會之演說」，正是成舍考察的心得紀錄。

文中成舍我摘錄倫敦市長於廣告大會開幕中的演講，強調廣告之於一國之國力與經濟政策的重要性。但成舍我（1930／2013，頁 28）也引申闡述廣告之於英國報業發展的影響：

> 英國報紙，在 1850 年前，其對於廣告價值，亦極輕視……，嗣因工商業之發展，及廣告稅之取消，此種態度，逐漸轉移，1853，《泰晤士報》，平均每日，已有廣告 1,500

> 則，至 1890，廣告戰爭，突趨激烈，自北巖爵士之《每日郵報》出版，廣告收入，乃進為報紙唯一之生命，迄至今日，多數主人，其辦報目的，已不在政治或其他社會關係，終日勾心鬪角，苦思焦慮者，惟在如何增加廣告收入。

這段英國報業與廣告互動的簡述，符合現今對英國報業史的詮釋。簡言之，19 世紀末以來英美報業的發展趨勢，大體是由於報紙工業化後得以大量生產、銷行於大眾之間，使報紙成為商品行銷與宣傳的重要媒介。於是吸引眾多廠商競相於報端刊登廣告，不但增加報紙收益也使報紙得以降低售價而普及於社會。成舍我更引述英國媒體對當時英國平價報的收支概算（表 4），說明廣告如何成為報紙經營者念茲在茲的命脈所在。

從表 4 可推算當時以底層大眾為目標群體的英國便士報，廣告收入佔其營收的 70%。相同的狀況也出現在美國，廣告佔美國報紙的收入比例也是逐年增加，至 1929 年時達到 70%的比重（1879，44%；1889，49%；1904，56%；1929，70%）（Williamson, 2012, p. 123）。英國報紙爭取廣告的競爭到 1930 年代更加激烈，各報須投入高額資金從事促銷活動，增加報紙銷量以獲廣告商青睞。如 1929 年重新發刊的《每日前鋒報》（*Daily Herald*），以贈送鋼筆、茶組、廚具甚至狄更斯全集的方式吸引讀者訂閱。最終《每日前鋒報》如願成為艦隊街四大報之一，但每年卻必須為此付出 300 萬英鎊的行銷費用（Williams, 2010, p. 154）。但也因為在廣告與行銷上的激烈競爭，英國報業於 1930 年代時的產值超越造船與化學業的產值，報業也從投機生意成為能夠穩定獲利的事業（Williams, 2010, p. 138）

**表 4：英國便士報收支概算**

| | | |
|---|---|---|
| 收入 | 報費 | 1,550,000 英鎊 |
| | 廣告費 | 3,000,000 英鎊 |
| | 小計 | 4,550,000 英鎊 |
| 支出 | 紙費 | 1,700,000 英鎊 |
| | 火車及運送費 | 40,000 英鎊 |
| | 印刷部 | 700,000 英鎊 |
| | 編輯部及各種稿費電費 | 200,000 英鎊 |
| | 廣告部 | 150,000 英鎊 |
| | 發行部 | 75,000 英鎊 |
| | 雜用 | 175,000 英鎊 |
| | 小計 | 3,400,000 英鎊 |
| 合計 | | 1,150,000 英鎊 |

資料來源：《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29），成舍我，2013，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 三、評價北巖革命

1930 年代英國報業高度資本化與集中化的發展，是累積西方世界近一世紀以來由傳播技術變革所引發文化革命的結果（Williams, 1976, pp. 24-25）。首先因引進蒸汽印刷機等新式生產工具，引起報業在生產方式上的激烈轉變。稍後 1855 年英國撤銷知識稅，報紙將公眾所關注的新聞事件以商品化的形式塑造，新聞從此被構思設計為可在市場上銷售並獲利的資訊商品。而 1870 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小學教育法》（Elementary Education Act 1870），更進一步擴大受眾規模，促成報業具備大量產製的工業基礎，商品化的營利模式成為現代報業與傳媒組織

的核心。這些商業組織大量依賴廣告收入，因而必須尋求更多的受眾以爭取廣告，也成為當下傳媒組織的主要目的。而傳播最原初的目的：人類經驗的分享，就不斷地受制於銷售的趨力。

這些轉變並非一蹴可及，也絕非憑一人之功所能成就。但北巖爵士發行的《每日郵報》卻是當中集大成者，再加上北巖爵士對廣告的重視及仿自美國的行銷報紙手法，使北巖爵士對現代英國報業發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將《每日郵報》所引領英國報業的一連串變革，稱之為「北巖革命」。《每日郵報》採用先進的傳播技術、行銷手法與文本寫作特徵從事新聞產製。而且由於英國社會大眾消費市場日趨成熟，使報紙得以在訂戶之外尋求廣告的金援，編輯也敏銳地訴諸不同身份的新興讀者（勞工、婦女、移民）。如此一來，廣告、發行流通與資本投資都成為報紙經營時必須考慮的因素。過往以內容作為報紙銷售的訴求，也由於訴諸廣告主而發生轉變，獲利的動機內化為新聞編採的準則，報紙所有權成為影響現代新聞事業發展的關鍵。

「北巖革命」引起的另一變革，則是透過併購的方式兼併競爭者，形成連鎖報業集團，以增加市場佔有率及收益，形成少數報團控制市場的局面。1910 年時北巖爵士控制 39%的倫敦日報市場、31%的倫敦晚報市場，接近 12%的倫敦週日報市場；1914 年時擴大為佔有 40%的倫敦日報市場，45%的倫敦晚報市場，15%的倫敦週日報市場。北巖爵士與其他兩位報閥 Cadbury 與 Pearson）經營的報業集團，控制超過 2／3 以上的倫敦日報市場與 4／5 的倫敦晚報市場（Williams, 2010, p. 140）。

1922 年北巖爵士過世，《每日郵報》發行量已達 175 萬份。聯合報業集團由其弟弟 Lord Rothermere 接手經營，擴張為控有 100 份週刊與月刊，同時掌握 4 家全國性報紙（*Evening Mail*、*Daily Mail*、*Daily*

*Mirror*、*The Times*）的報業集團。次於聯合報業集團報團規模的報團是由 Lord Beaverbrooks 所掌握，以 *Daily Express* 與 *Evening Standard* 這兩份發行量在全英達到 410 萬份為主的報團。再加上控有 *Daily Telegraph*、*Financial Times* 的 Lord Camerose 與 Lord Kemsley 兩兄弟的報團。四位受封爵士的報閥，掌握英國近半數的全國性與地方報、1／3 的週日報，報紙銷售量加總達到 1,300 萬份（Williams, 2010, p. 165）。

成舍我訪英時，正巧遇上英國報業人士集資於艦隊街設立北巖爵士銅像的落成典禮。「北巖爵士銅像落成」的部份，成舍我記載時為英國報界公會會長，也是 *News of the World* 經營者的 George Riddell 於落成典禮上的致詞。G. Riddell 強調北巖爵士對報紙普及於大眾、使版面生動活潑、及追逐新穎、確實新聞的貢獻。成舍我大致同意上述評論，但也指出報紙為求銷售，強調人情趣味等新聞所可能帶來的不良影響：

> 平心而論，北巖之「興趣」「廉價」政策，誠足以貶損報紙之價值，然二十世紀之報紙，其目的絕非僅止於供給一部份知識階級，欲求報紙銷行於一般市民，自非淺顯生動之文字，及最低之售價，不能奏效，所惜者，即此種政策，有時行之過當，且其大部份動機，多半出於資本家獲利之一念，而非欲供給一般平民以何種善良之知識，此則吾人所不能為北巖諱也（成舍我，1930／2013，頁 32）。

成舍我不反對以低廉價格銷行於民眾的大眾化報紙，1935 年成舍我集資創辦的上海《立報》，號稱銷售未達 10 萬份前不登廣告，宣傳「一元錢看三個月」的低價策略；內容上強調精編改寫、短小精悍的新聞寫作，以庶民所能理解的語言報導要聞，使民眾知曉世界大勢與國家處境，顯然都是受北巖爵士的影響。

結束倫敦參訪後，成舍我赴巴黎繼續考察行程，之後渡海拜訪影響

中國新聞教育極深的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Walter Williams，於 1931 年 2 月回到上海。返回中國後，成舍我原預計從政治、經濟、教育與新聞事業等角度提出考察報告。但最終只有政治與經濟兩部分的考察心得，以〈就算是我的感想〉（成舍我，1931b／2013）為題，連載於《世界日報》與《民生報》上，其餘則未見諸報端。但同年三月成舍我於《民眾週報》上發表〈世界新聞事業的發達與中國報紙的前途〉一文，言簡意賅地陳述西方報業進步的原因及結果，並力陳未來的中國報業必須避免重蹈西方報業資本化的覆轍：

> 歐美報紙，受了資本主義的控制，生出許多流弊，我們是不能再去抄襲。我覺得新聞事業，固然要商業化，但是這種商業，絕不能和普通商業一樣。報紙的主張和言論，應該完全聽「民意」的支配，不能由一二資本家，任意操縱（成舍我，1931c／2013，頁 47）。

## 伍、報業發展的替代方案

西遊對成舍我最大的衝擊，莫過於親睹西方報業受惠於資本主義所帶動的發展，報業不但得以改進生產設備，也提昇新聞編採品質。但從北巖爵士與赫斯特等人身上，成舍我又看到這些經營者的目的：「只在賺錢，他們對於一個新聞的記載，大部分只求怎樣可以迎合社會病態的心理，誨淫誨盜的消息，儘可以長篇累牘，觸目皆是。」（成舍我，1931c／2013，頁 47）「一都分英美報紙，更藉『言論出版自由』的護符，為資本家招財進寶的工具，敗壞風化，唯利是圖。」（成舍我，1944／2013，頁 236-237）如何不讓報紙受資本家染指，又能反映民意，是成舍我思考未來中國報業發展藍圖時的關鍵議題。中日戰爭後

期，成舍我（1944／2013）於「中國新聞學會」的機關刊物《中國新聞學會年刊》上發表〈報紙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提出超越中國報業發展現狀，卻又充分體察資本化報業市場弊病後的報業發展藍圖。依照成舍我的說法，此一藍圖可以四句話概括：「資本家出錢，專家辦報，老百姓說話，政府認真扶助、依法管制。」

## 一、資本家出錢

成舍我首先分析當時存在於報紙與國家間的不同關係模式：「英美式高度言論自由」、「蘇聯式報紙國有」與「法西斯式報紙統制」。成舍我認為「英美式報業體制」優點是：「民主政治基本要件之一，是大家不受欺蒙，能真正得到一切公平可靠的消息，然後全國國民，乃根據這種正確消息，發表主張，批評得失。」（成舍我，1944／2013，頁 243）但缺點是：「這種自由卻完全被報紙的所有者，換言之，即少數資本家劫持操縱，宰割無遺。英美人民，既不能個個辦報，個個都是報紙的主人，只好眼看少數資本家，打著『代表輿論』旗幟，實行其自私自利勾當。政治上的黨同伐異，固不待論，下焉者，為求迎合低級趣味，更不惜敗壞人心，流毒社會。」（成舍我，1944／2013，頁 244）

「蘇聯式報業體制」，在憲法中明文保障言論自由，但卻限於無產階級。理論上蘇聯為無產階級專政國家，如此規定自然也保障蘇聯所有國民的言論自由。但成舍我認為，中華民國在三民主義政策下應以追求全民福祉為目的，自不宜採蘇聯式報業體制。「法西斯式報業體制」，恰與英美式成為對比，新聞出版須事前檢查，政府更可任意取消發行登記，毫無言論自由可言，自無可取之處（成舍我，1944／2013，頁 244-245）。比較各國報業體制的利弊後，成舍我（1944／2013，頁 246）

認為「世界現行的三種制度，沒有一種可容許我們囫圇抄襲」，必須根據國情重新構思新的報業體制以因應。

成舍我首先確認言論自由的必要性，政府不應限制人民自由辦報的權利。但從各國報業發展狀況來看，報業發展勢必走向資本化與集中化，如此將使報紙成為少數資本家所壟斷的言論工具：

> 中國報紙，如果不成為國家獨占事業，而允許私人經營，則無疑的，這種事業，一定會一天一天走向大規模資本化。也和經濟的自由主義下其他事業一樣，資本越小越賠本，越大越賺錢，結果，小資本報館無法存在，大資本聯銷制（chain system）的報業托拉斯，即應運而興。唯一原因，就是現代報紙，需要高速印刷機，及一切新式裝備，如飛機運送，電傳寫真之類，這些工具，都絕非小資本所能置辦。而且資本愈大，所辦報館及附屬事業愈多，支出愈能節省、成本愈能減輕（1944／2013，頁 247）。

「報紙不能不需要資本，也不能不相當的商業化」（成舍我，1932／2013，頁 62），這是成舍我 1932 年演講〈中國報紙之將來〉時的論斷，而且「英美資本化私人經營之新聞事業，並非絕無優點」（成舍我，1943／2013，頁 220）。究其原因在現代報業經營者必須投注大量資本於生產設備上，藉以提升產製效率與新聞品質。因為無論租用電報、外派專人採訪、購置外電專訊，無一不需資本。這也是前文闡述文人辦報傳統衰退、歐美報業大幅超前發展的主因。

問題出在，一旦報紙為資本家掌握後即淪為謀利工具，報紙不但充斥低俗黃色新聞，而且「報館的主權和政策，一律只有仰承主人的意旨，不敢輕有違反。」（成舍我，1932／2013，頁 62）如成舍我西遊時所見，英國兩位報閥如何鼓動政潮，黃色新聞又如何遠離民眾疾苦，

如此都讓報紙無法成為真正反映「民意」的機構。因此如何將「言論權」與「資本權」予以分立、各安其位，是此一規劃藍圖的關鍵所在。

## 二、專家辦報

成舍我在論述其所規劃的報業發展藍圖時，申明是基於「言論」與「資本」分立而來的構想。在 1932 年於燕京大學演講〈中國報紙的將來〉時，成舍我（1932／2013，頁 66）即主張：

> 關於報館主張及言論，應另有一監督機關，所有報館對政治、社會的批評，概應受此機關指導。總編輯之進退，亦應由此機關決定。此機關之人選，應由社會民眾團體推選。而每一報之讀者，亦得有權推代表參加每一報館之此種機關。如此，則個人操縱輿論，或違背公眾福利的弊害，自可剷除。

中日戰爭期間，無報可辦的成舍我，依舊相信此一監督報紙言論的機構若能付諸實行，資本家、報閥操縱輿論，新聞報導違背公序良俗的狀況，自當消滅。而且對此機構的組成有更詳細的規劃：

> 每一報館，必須組織一編輯委員會。私立學校創辦人，必須組織一董事會，不能視學校為個人私有，其意義亦頗與此相似。委員會人選，除三分之一得由投資主辦報館者自由延聘外，其餘三分之二，則應依一定比例，由學術機關，公共法團，讀者代表，分別選派……。此編輯委員會一經成立，則凡主筆、總編輯之任免，報館言論政策之制定，及對每一重大事件發生時採取之態度，即悉應由其決定，主辦報館者，無權干涉（成舍我，1944／2013，頁 251）。

曹立新（2012b，頁 162）將成舍我此一言論與資本分立的規劃，

稱為「成舍我方案」。認為這種將報紙與社會結合的制度設計，實際上就是主張報紙公共化，已頗接近 1970 年代德國的編輯部諮詢委員會，及 1990 年代台灣出現的編輯室公約。事實上，仔細考證成舍我將「編輯委員會」等同私校董事會的公共化理念，以及由「編輯委員會」主管言論、人員任免的構想，並非憑空而生。在 1932 年的〈中國報紙的將來〉中，成舍我（1932／2013，頁 67）提到：「英國工黨機關報 *Daily Herald*，現在很想向這方面去」，而在 1944 年的〈報紙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中，更清楚地說：「《每日前鋒報》將經理權交一出版公司管理，言論權則由工黨主持，都稍稍含有言論不受資本控制的意義。」（成舍我，1944／2013，頁 250）成舍我區分報紙「言論權」與「資本權」的構想，顯然受惠於英國《每日前鋒報》（*Daily Herald*）的轉型經驗。

《每日前鋒報》於 1912 年以 300 英鎊開辦，是由勞工階級提供資金並實際經營管理的全國性報紙。開辦之後的營運經費主要依賴勞工的捐助，發行量曾達 25 萬份。1914 至 1919 年間，由於資本短缺，從日報轉型為週報出版。1919 年重新以日報形式發行但仍持續虧損，至 1922 年轉售前總共損失 40 萬英鎊（Chalaby, 1998, p. 73）。1922 年由英國工黨與英國全國總工會（Trade Union Congress）購入，成為兩機構的機關報，但依舊無法改善虧損狀況（Curran & Seaton, 1997／魏玓、劉昌德譯，2001，頁 55）。1929 年 Odhams Press 為充分利用印刷機具，而出資購入《每日前鋒報》51%的股份，並與工黨及總工會達成協議，由 Odhams Press 負責報紙的經營管理，工黨與總工會主導政治與產業政策的言論內容。改版後的《每日前鋒報》，發行量從 1929 年的 30 萬份不斷攀升，於 1933 年達到 200 萬份（Thomas, 2005, p. 12）。儘管《每日前鋒報》與其他報紙在行銷、廣告上迭有競爭，但《每日前鋒

報》依舊堅持對嚴肅新聞的報導，是當時大眾報紙中，少數不報導賽馬新聞與刊登連環漫畫的報紙（Williams, 2010, pp. 154-155）。

## 三、老百姓說話

從《每日前鋒報》成功改組的案例中，促使成舍我相信組織一個囊括由資方、公眾與學界代表組成的「編輯委員會」，可確保報紙言論的公正性與新聞編採的獨立性。但除了透過制度設計保障新聞事業的獨立地位外，報紙要真能反映民意，資本家還必須體認新聞事業並非一般營利事業。成舍我（1944／2013，頁 250）認為歐美報業所以淪為報閥私人言路的原因在於：「英美學者，通常未認識新聞事業亦為公用事業之一種。他們總以報紙為一種私人經營的自由商業。」經營報業者，由於缺乏公共服務的精神，才導致鑽營私利、犧牲公益的現象。

成舍我主張從報紙的社會影響而言，報業所生產與銷售的產品絕非一般商品，性質接近供給大眾必需品的公共事業，故而投資報業的資本家必須體認其一言一行，應接受社會公眾監督：

> 新聞事業，歡迎他們投資，但只許他們和投資其他有關公共福利的事業一樣，於獲取合法利潤外，仍須聽從國家或社會有關公團之控制……，資本家不應以投資關係而即攫整個報紙並其言論權為個人私有（成舍我，1944／2013，頁 250）。

在早期的談話中，成舍我更主張由於報紙具備公共服務的功能，也應在價格上貼近庶民，讓更多的民眾有能力負擔：

> 報紙要民眾化，自不應該多收報費。他是社會上最重要的公器，他實在應該儘可能範圍以內，能像公園，圖書館一樣，

給民眾以公開欣賞閱讀的機會（成舍我，1932／2013，頁78）。

倘若報業勢必委由私人經營，又如何能不計盈虧地以低廉價格而使報紙、新聞普及於民？一方面，成舍我根據西遊時對英美報業的考察心得，相信日後報業的主要收入不再是訂戶、零售而是廣告收入（參考表4）；另一方面，成舍我樂觀地相信，既然透過「編輯委員會」所決定的言論與新聞走向是代表老百姓說話的公共言論機構，則勢必能夠得到讀者大眾的支持並反映於銷量之上：「銷路多則廣告多，廣告多則利潤多。今以代老百姓說話，而得到大量銷路，對於資本家爭取利潤之目的，並無損害。」（成舍我，1944／2013，頁 252）

同樣的樂觀態度，也反映在成舍我對新聞工作者的期待上。一份能夠為老百姓說話的報紙，除了經營者必須體認報紙具有公共服務的特質，新聞記者也必須自省「雖然不是真接受了大眾的委任，但他的心中，應時時刻刻，將自己當作一個大眾的公僕。」（成舍我，1933／2013，頁 97）。前文論述民初報業環境時提及，一方面由於低劣的物質條件導致民初報業的不發展，另一方面當時的新聞記者，仍在「江浙無賴文人」的負面形象中，若非充當政治幫閒就是淪為文化流氓。

即便到 1930 年代中國報業蓬勃發展的階段，這些現象依舊存在。甚至由於新聞報業已具備影響社會輿論的可觀力量，記者憑恃言論自由大傘自視為無冕王，捕風捉影、惡意貶否，時有所聞。阮玲玉自戕前留下「人言可畏」四字，非指街頭巷議的蜚短流長，而是上海報界對阮玲玉的惡意攻擊。成舍我因而強調，資本家固需受社會大眾的監督，新聞記者也得拋棄無冕王的虛矯身段，扮演反映真實民意的角色：

「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這句話，在從前，固然僅是想表現他的獨立和自由，然實際上，卻只利用了這句成語，來掩

> 飾新聞記者驕傲、狂妄和自私……。未來的新聞事業，新聞記者，只是在「民眾」，「讀者」監督指導下一個忠實服務者，他不能再以自己或他的主人的個人愛憎，來強姦民眾的意思（成舍我，1932／2013，頁 67）。

## 四、政府認真扶助、依法管制

成舍我此一報業藍圖規劃的前提是保障言論自由，在這前提下由於報業市場的資本化與集中化，導致言論無法真實反映民意，淪為報閥遂行個人意志的傳聲筒，因此藉由設立「編輯委員會」限縮報業經營者的權力。同樣在保障言論自由的前提下，成舍我（1944／2013，頁 253）認為政府對報紙的管制：「除了最不得已外，頂好能包括在一般法律範圍以內。特別為報館訂定的法律，以愈少愈好。」1943 年國民政府推動《新聞記者法》，成舍我於「中國新聞學會」年會中領銜提案，在潘公弼、馬星野與黃少谷等人連署下，呼籲不可施行《新聞記者法》。1952 年在台灣的國民政府試圖修改《出版法》，成舍我也以立法委員身分提案反對。

成舍我所持理由皆相同，因為法案所欲規範的內容大體涉及誹謗、撤銷登記等事宜，在《刑法》、《公司法》中都已有相關規定，無須另訂特別法。但成舍我也絕非如英美自由主義者般，堅決反對政府制定任何新聞法規，否則也不會主張立法規範報紙必須設置「編輯委員會」，以實現老百姓說話的理想。關鍵在成舍我認為政府對新聞事業的任何管制除須依法行事外，「其唯一目的，無非促進新聞事業發展。」（成舍我，1944／2013，頁 254）1943 年成舍我於桂林《大公報》上為文力阻《新聞記者法》的理由即為：「記者為新聞事業中最主要因素之一，維護記者即所以扶助新聞事業。然就《記者法》全部條文看來，除統制

外，實在找不到有任何切實扶助的跡象。」（成舍我，1943／2013，頁205）

文中除反駁草案與既有法規重疊和不合理之處外，更具體提出扶助新聞事業發展的方法。包括：褒揚撫卹有功於國家之記者；與新聞採訪、調查有關之事項可請求政府協助，並予以補助交通郵電費用等。特別之處是成舍我（1943／2013，頁 208）要求國家予以限制下列事項：

（一）新聞記者之待遇，應視當地生活程度，由主管機關會同該地記者公會，規定一最低之標準。遇重要物價劇烈變動時，得隨時予以調整。

（二）新聞記者之工作時間，通常應以每晚十二時為止，其擔任十二時以後之深夜工作者，每人所擔任工作時間之總數，應不得超過四小時。

（三）新聞記者，每星期應休息一日。

薪資、工時、休假，這三件需由國家立法限制的事項，全與新聞記者的勞動條件相關。顯見成舍我除了透過理念上的呼籲，要求新聞記者放棄妄自稱大的無冕王身分、認同大眾公僕的角色外，更體認到整體報業環境在歷經資本化的衝擊後，新聞記者的職業角色與受雇條件大幅改變的現實：

> 新聞記者之是否為自由職業，在今日已大成疑問。因「自由職業」（liberal profession）之含義，係指依個人意志、才力，獨立營生，無一定僱傭關係者……。初期之新聞事業，「文人辦報」聲氣相求，即或有館主與職工之分，亦多互相敬重，去就自由，並無一定僱傭關係之拘束……。中國新聞事業，其資本化與企業化之程度難尚不如英美，然赤手空拳之『文人辦報』時代，則確已過去。新聞記者之僱傭關係，多數

亦已逐漸演變成為固定（成舍我，1943／2013，頁 210）。

成舍我並舉「美國新聞職工總會（American Newspaper Guild）要求提高待遇、縮短工時而多次發動罷工運動為例，反問「此種記者如何尚可稱為自由職業？」（成舍我，1943／2013，頁 210）顯然，成舍我認為產業化後新聞工作者成為須受組織聘僱、以機構之名從事新聞編採的新聞勞工，已非來去自如的自由工作者。記者無法自外於機構而獨立自存，只能受命於雇主指派從事新聞編採，成為製作新聞的生產工具。

甚至當報紙走上產業化的發展後，資本化導致報業市場的集中，不但使辦報不再輕易可為，勞資關係也將大幅惡化乃至對立：「辦報的老闆，可以與報紙工作不發生關係，只要拿出了資本，終年不入報館大門，也可以坐分紅利幾十萬元。勞資的對立，日趨尖銳。」（成舍我，1933b／2013，頁 91）若勞動條件低劣不予重視，如何能產出代表民意的忠言讜論？這三項要求政府予以限制的事項，雖然僅從改善勞動條件著手而未觸及更根本的生產關係，卻已超越同時代人對新聞工作與報業的理解。

## 五、小結：公共化之必要

民國時期的學者與報人，多從政治勢力如何影響或戕害新聞表現而評斷報業發展狀態。林語堂（2008，頁 1）即認為「懸新聞自由之理想為鵠的，並以之為衡量新聞事業成敗的標準。」自北洋時期辦報並深受新聞檢查所害的成舍我，必然知曉新聞控制對報業發展的危害。但成舍我卻比同時代人更早看到產業化、資本化後的報業環境，已無法憑恃「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士人理念，抵擋沛然莫之能禦的新聞商品化潮流。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威脅不只來自亟欲操縱輿

論的政治黑手，也來自追求利益極大化的市場邏輯，迫使報業無能反映真實民意。因而早在 1934 年成舍我（1934／2013，頁 103）即感嘆：

> 昔人謂袁世凱統制報紙之方術，為左手執刀，右手執支票，袁世凱雖逝，彼袁世凱之精神，固依然充滿活躍於此二十餘年來之中華民國，而報紙厄遠，所以至今未已，或尤變本加厲也。報紙在刀與支票之兩大勢力之下，事實上，早已無處可以覓得所謂真正之輿論。

成舍我的感慨與主張，對當時的新聞同業而言，純屬杞人憂天的多慮，但 1930 年代的憂慮卻在 1980 年代報禁解除後的台灣社會重現。報禁解除後新設立的報社，幾乎無一倖免地以關門收場：1990 年代《自由時報》、《聯合報》與《中國時報》的行銷大戰，更讓報業市場朝資本化、集中化方向發展。及至 2000 年後，網路媒體興起、數位匯流蔚為主流，為求銷售所形成的市場新聞學已成大勢，貽害更是有增無減，新聞工作者的勞動權益與社會地位更形惡化。傳統報紙若非轉型為軟性、消費取向的通俗新聞路線，就因入不敷出而倒閉或為其他傳媒集團併購。平面報紙難以藉由媒體本業獲利，已是眾所皆知的經營困境。因而，近年台灣幾起報紙交易事件中，接手者並非純然出自經濟動機，而是混雜政治目的，以經濟手段所行之的壟斷併購。此刻台灣所面對的媒體壟斷，已是更加複雜的問題。

而且由於當時中國經濟發展落後、教育尚未普及，成舍我熱切期待興辦一份「人人買得起、看得懂」的大眾化報紙。如今受惠於網路技術的普及，新聞資訊不但免費取用，用字遣詞之通俗口語，遠非成舍我所能預見。早年成舍我樂觀的相信一份報紙只要能真心為老百姓說話，必能獲取大量讀者之青睞，廣告、利潤理當接踵而至，既然無損資本家牟利，報業主自當接受「成舍我方案」。但顯然台灣的報業與傳媒表現，

並未因新媒體的開放技術而帶來更民主解放與多元差異的傳媒文化，反倒是回到百年之前、現代報業興起之初，各擁黨派立場的狀況。

如今興辦傳媒若非出自營利考量，便是重蹈上世紀英國 Lord Rothermere 及 Lord Beaverbrook 等報閥手握傳媒第四權，僅憑私己好惡，鼓動政潮等不負責之舉。美國的黨派報、英國的基進報刊，乃至中國文人辦報之所以傾頹，不只出於政治上的不寬容，另一關鍵是報業、傳媒產業化後，新聞資訊商品化所致。如果這些歷史上隨著資本化而消逝的報業模式有一絲可取之處，應當是過往的報人僅需少許資本、無需考慮市場，就能暢所欲言、各抒己志。其言論意見的多元生猛，絕非當前單憑發行量、點閱率、收視率為考量的傳媒所能比擬。

當代傳媒由北巖等報業勳爵（press barons），轉變由梅鐸之類等跨媒體大亨（media moguls）操控，兩者的影響層面自不可同日而語。但藉由經濟壟斷、創造綜效的手段依舊相同，新聞商品化的企圖也無不同。成舍我對民國報業的反省批判，乃至根據當時情境所提出的「成舍我方案」，可貴之處不只在宏觀地從跨國比較視野中，發現資本化、市場化趨勢對報業表現的負面影響；也不只因今日台灣傳媒人士依舊奔走疾呼傳媒事業需區分資本權與言論權，並納入公民讀者之問責機制而汗顏。而是成舍我認定新聞報業不應與其他產業等同視之，是類似公車、自來水般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公用事業（成舍我，1944／2013，頁 251）。正因將新聞報業視為公共事業，成舍我才不認為資本家能因投資關係而攫取報紙的言論權為私有，正如同私校不因私人捐助而為私人家產，私校實質上已屬社會所共有之公共財是同樣的道理。

在成舍我生存的年代中，因新聞管制的慘痛記憶而對政府介入戒慎恐懼，成舍我方案中的「政府認真扶助、依法管制」，屬於消極自由的概念與提議。但成舍我也察覺勞動條件的保障，對確保新聞報業的產出

表現至關重要。Barker（2002／馮建三譯，2008，頁 227）指出，直到 19 世紀中之前，美國國會對廣告採取的是差別性的郵政待遇，不給予廣告任何優惠，甚至課以更多的郵資，以此減低廣告的作用。即便在台灣，1951 年成立的「台北市民營報業聯誼會」，組成目的是聯合同業之力，爭取政府公告刊登於民營報紙而非獨惠黨公營報紙，並爭取降低貸款利率等有助報業生存的優惠政策。透過政策立法扶助傳媒產業，促進資訊公平流通，在歷史上並非絕無僅有。倘若新聞報業之於民主社會與公共生活至關重要，解決方案的思考就不應限於如何改善平面媒體或獨立媒體的經營績效以適應資本市場。而是確認新聞報業之必要後，以具體政策補助新聞產製與資訊流通的公平性，創造人人都能說話的傳媒環境。

## 結語：新瓶舊酒的壟斷

對成舍我而言，1930 年代的中國報業早已告別因陋就簡的文人辦報，進入集團資本壟斷的商人辦報階段，報紙不但成為營利事業，為求銷售獲利而訴諸聳動的黃色新聞，更難兼顧私利與公益。中國報業起步雖晚卻後發先至，新聞商品化的現象與英美相比絲毫不遑多讓。出自個人意識型態信仰，也與成舍我為報業經營者的身分相關，成舍我反對報紙國有化的主張，認為若能將英國《每日前鋒報》區分「言論權」與「資本權」的成功經驗移植轉化於中國，即能創造出既不損害新聞自由，又能解決報業發展需要龐大資本的兩難。

1947 年美國的「赫欽斯委員會」（Hutchins Commission）發表《自由而負責的報業》，此一日後被視為「社會責任論」濫觴的知名報告。同樣在 1947 年，因報業壟斷與所有權問題日趨嚴峻，英國國會決議設

立「皇家報業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ress），調查言論自由與新聞正確性的狀況。英美兩國為報業壟斷問題而設的調查委員會，有相同的社經背景，也得到相仿的結論：1.媒介市場上的壟斷和所有權的集中，已經威脅意見表達自由；2.新聞事業不是一般的營利行業，是民眾獲取消息、意見與觀念的主要來源，新聞媒介有義務負起社會責任，成為社會公器，讓民眾有機會接近傳播媒介的機會（陳世敏，1989，頁 26）。

在此脈絡下，後繼論者也就在如何使媒體自律能夠發揮效用，或如何建立媒體問責制度以履行公共責任等問題上爭辯。但這樣的討論，忽略兩個委員會成立並擔憂的歷史脈絡。也就是傳媒體制由於技術變革引起的傳播革命，使得傳媒傳遞訊息的範圍與所能企及的受眾數量大幅增加，導致傳媒產業集中化與壟斷。長期以來傳媒趨於集中的現象，在 1990 年代後已反覆出現（Barker, 2002／馮建三譯，2008，頁 193）。當下的大眾傳媒已成為大型企業，傳媒所有者視傳媒為私有財而非公共服務的工具，凡事以獲利為先而使傳媒表現日益低落，不但喪失公眾信任，也激發公眾要求政府介入管制的呼聲，形成對新聞自由的嚴重威脅。歸根究底，傳媒產業化導致的集中與壟斷，才是造成傳媒內容日益低劣、言論單一且不受公眾信任，甚至要求政府介入的主要病徵。

1930 年代中國報業的發展時間與程度，雖未如英美報業般的普及與深入，報紙、傳媒產業僅以城市地區為主要的生產與消費場所，但在上海與北平等政經中樞，卻複製英美報業的發展模式：引進新式印刷傳輸工具提昇新聞編採品質，轉變報紙為高度資本化的現代產業，資本成為創設報紙所需面對的首要問題。不但使眾聲喧嘩的文人辦報黯然失色，為確保獲利以壟斷形成的高度集中化市場，更使報紙日益遠離反映真實民意、倡議發聲的公共論壇角色。成舍我所提「資本家出錢、專家

辦報、老百姓說話、政府認真扶助依法管制」的報業發展規劃，必須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才能妥當地理解。

藉由成舍我對當時報業發展的觀察，研究者應當重新思考，新聞史研究中所認定的文人辦報傳統，究竟中斷於何時？除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水土不服、統治者對言論的不寬容等解釋外，資本與市場對民國報業的新聞產製與內容產生怎樣的影響？壟斷的報業市場是否限縮民初百家爭鳴的多元言論景象？被視為象徵民初消費與庶民生活的《申報》、《新聞報》等商業報紙，究竟是避免惹禍上身而刻意閃躲政治言論、凸顯大眾報刊的路線，或根本是借鏡英美便士報的經驗，本身就是市場趨利動機下的商業產物？

對傳播與文化研究有深刻影響的 Raymond Williams 認為，傳播所以重要是在於人群透過傳播活動，方得以分享與傳遞經驗並創造文化，文化也就在特定的傳播模式與互動慣例中被保留或更新。一旦既有的傳播模式不再適用，也就必須創造契合當代情境的新傳播模式。19 世紀開始由新傳播技術引發的傳播革命，促成傳播工具的普及化並使公眾數量得以顯著的成長，但「傳播工具的控制與所有權卻因資本問題而被窄化。」（Williams, 1976, p. 26）。Williams 認為值此情境下，必須對傳媒的所有權予以限制。倘若成舍我所心繫「老百姓說話」與「報紙如何真能反映民意」，仍為當下台灣傳媒人士所掛念，那麼如何使傳播工具民主化，政府如何妥適地以相關政策或補助，促進新聞報業與傳媒產業的發展，仍舊是必須嚴肅思考的關鍵問題。

# 註釋

1　Dirlik（1993／孫宜學譯，2006，頁 140）引用斯諾對毛澤東的訪談以及陳獨秀傳記研究者的觀點主張：「到五四運動前夕，無政府主義詞彙已經變成為中國激進主義語言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並不是說中國知識分子都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者……。最重要的是無政府主義思想進入了那些嚴格說來根本不能被稱作無政府主義者的人的語言中，無政府主義成了革命話語的核心。」換言之，成舍我將報刊命名為「世界」、倡導工讀、強調互助等無政府主義色彩的主張，不見得是出自思想上的信仰，也可能是無政府主義所倡導的世界主義、互助合作、勤工儉學，是五四前後於中國思想界與學生群體中極為流行的概念詞彙。

2　據馬之驌（1986，頁 155）所載，當時報社批發給報販的價格為報價的七折，《世界晚報》為爭取更多的報販為其銷售，以五折的批發價將報紙銷售給報販零售，《世界晚報》的成功與低廉的批發價有極大關係。

3　「上海市黨部多次向兩報致意，表示歐美報紙日銷數百萬、日出一二十張，中國報紙卻至多日銷十幾萬、日出七八張。原因即是缺乏資金，故願意投資改為官商合辦。」（高郁雅，2015，頁 226）

4　《新聞報》在 1916 年於美國德拉瓦州註冊登記為 2,000 股，福開森持有 1,300 股占 65%，其他股東有 700 股占 35%。改組後的《新聞報》資本額為 120 萬元，股份仍為 2,000 股，史量才讓出已購入 1,300 股中的 300 股，持股 50%（馬光仁，2014，頁 686~693）。

5　1930 年 6 月《時事新報》組織股份有限公司，於實業部登記資產為 20 萬元，1931 年 10 月增資為 35 萬元。《大陸報》於 1930 年 10 月轉讓給張竹平、董顯光等人，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張竹平佔 1／3 股份（馬光仁，2014，頁 760）。1930 年 2 月因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而提前發刊的《大晚報》，最初資金為 5 萬元，1934 年增資為 10 萬元，張竹平持有 26%的股份（姚福申，1997，頁 60）。另據馬光仁（2014，頁 761）的研究，張竹平在四社各單位所持股份皆約為 1／3，但由於四社各單位皆由張竹平出面集資募股，四社的經營權實際上為張竹平所主導。

# 參考文獻

方漢奇（1996）。《中國新聞事業通史》（第 2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方漢奇（2004）。《大公報百年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王潤澤（2010）。《北洋政府時期的新聞業及其現代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成舍我（1973）。〈新聞老兵六十年〉，《新聞學報》，頁 1-5。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編採學會。

成舍我（1930）。〈在倫敦所見英國報界之新活動〉，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15-33。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1a）。〈英法報紙之比較：我所見之巴黎各報〉，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35-43。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1b）。〈就算是我的感想〉，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325-371。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1c）。〈世界新聞事業的發達與中國報紙的前途〉，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45-48。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2）。〈中國報紙之將來〉，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55-86。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3a）。〈我們的兩個目的〉，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97-100。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3b）。〈如何使報紙向民間去〉，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87-95。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34）。〈報學瑣談之六：羅斯福歡迎報紙指責政府〉，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103-104。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43）。〈新聞記者法應速設法補救〉，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235-256。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舍我（1944）。〈報紙必如何始真能代表民意〉，黃順星（2013 編），《成舍我先生文集大陸篇・新聞事業》，頁 235-256。台北：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成露茜、唐志宏、李明哲（2010）。〈無政府主義的影響和實踐：成舍我的「非資

本主義大眾化報刊」〉，《新聞學研究》，106: 219-248。
吳廷俊、沈靜（2014）。〈多元報刊群落不均衡生長：南京國民政府前十年的報刊生長狀態考〉，《新聞學研究》，118: 131-170。
宋軍（1996）。《申報的興衰》。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李仁淵（2005）。〈新式出版業與知識份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為例〉，《思與言》，43(3): 53-105。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李金銓（2008）。〈導論：近代中國的文人論政〉，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1-32。台北：政大出版社。
汪仲韋（1982）。〈我與《新聞報》的關係〉，《新聞研究資料》，12: 127-157。北京：展望出版社。
林語堂（1936）。《中國新聞與論史》（2008）。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姚福申（1997）。〈四社：舊中國報業集團化經營的一次嘗試〉，《新聞大學》，1997，冬：57-61。
唐海江（2013）。〈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成舍我自由主義報刊理念的形成與困境〉，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 189-21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孫宜學譯（2006）。《中國革命中的無政府主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原書 Dirlik, A. [1993].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馬之驌（1986）。《新聞界三老兵：曾虛白、成舍我、馬星野奮鬥歷程》。台北：經世書局。
馬光仁（2014）。《上海新聞史（1850-1949）》修訂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高郁雅（2015）。《櫃台報：上海新聞報研究（1893-1949）》。新北市：輔大書坊。
張玉法（1989）。〈從「北伐」到「抗戰」的報業〉，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 351-401。台北：三民。
張育仁（2002）。《自由的歷險：中國自由主義新聞思想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張季鸞（1979）。《季鸞文存》。台北：台灣新生報社。
許紀霖（2008）。〈近代中國的知識人社會〉，許記霖（編），《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頁 1-3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曹立新（2012a）。《讓子彈飛：戰時中國的新聞開放與管制研究（1937～1945）》。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曹立新（2012b）。〈世界變了，何以立報：新聞史中的「成舍我方案」之研究〉，《中華傳播學刊》，21: 155-179。

陳世敏（1989）。〈讀者投書：「接近使用權」的實踐〉，《新聞學研究》，40: 25-46。

曾虛白（1989）。〈總論〉，曾虛白（編），《中國新聞史》，頁 1-28。台北：三民。

馮建三譯（2008）。《傳媒、市場與民主》。台北：巨流。（原書 Barker, C. E. [2002].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The Press Syndicate of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黃天鵬（1930）。《中國新聞事業》。上海：上海聯合書店。

黃瑚（2005）。《中國新聞事業發展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黃順星（2009）。〈模糊的文人，相異的實踐〉，《新聞學研究》，100: 297-306。

劉豁軒（1941）。〈中國報業的演變及其問題〉，《報學》，1(1): 5-13。北京：燕京大學新聞學會。

熊少豪（1922）。〈五十年來北方報紙之事略〉，楊光輝、熊尚厚、呂良海、李仲明（1986 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頁 433-440。北京：新華出版社。

賴光臨（1980）。《中國近代報人與報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賴光臨（1981）。《七十年中國報業史》。台北：中央日報社。

魏玓、劉昌德譯（2001）。《有權無責：英國的報紙與廣電媒體》。台北：鼎文書局。（原書 Curran, J. & Seaton, J. [1997].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The press and broadcasting in Britain* (5th ed.). London, UK: Routledge.）

蘇精（2000）。《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台北：學生書局。

Baran, P. A. & Sweezy, P. M. (1966). *Monopoly capital: An essay on the American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Chalaby, J. K. (1998). *The invention of journalism*. London, UK: Macmillian.

Chin, S. J. (2014). Print capitalism,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ass media in 1930s China, *Modern China*, *40*(4), 393-425.

Compaine, B. M. & Gomery, D. (2000). *Who owns the media?: Competition and concentration in the mass media industry* (3rd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Conboy, M. (2004). *Journalism: A critical history*. London, UK: Sage.

Conboy, M. (2011). *Journalism in Britain: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UK: Sage.

de Burgh, H. (2003). The journalist in China: Looking to the past for inspiration. *Media History*, *9*(3): 195-207.

Lee, A. J. (1976). *The origin of the popular press, 1855-1914*. London, UK: Croom Helm.

MacKinnon, S. (1997)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Modern China*, *23*(1), 3-32.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Schudson, M. (2003). *The sociology of news*. New York, NY: Norton.
Sweezy, P. M. (1970). *The theory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 Principles of Marxian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NY: Monthly Review Press.
Thomas, J. (2005). *Popular newspapers, the Labour party and British politics*. London, UK: Routledge.
Williams, K. (1998). *Get me a murder a day!: A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in Britain*. London, UK: Arnold.
Williams, K. (2010). *Read all about it: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ewspaper*. London, UK: Routledge.
Williamson, M. (2012). When popular was radical: The mass circulation US press in the 1890, emerging celebrity journalism, and popular tastes. *Media History*, *18*(2): 115-127.
Williams, R. (1976). *Communication* (3rd ed.). London, UK: Penguin Books.

# The Monopoly of Republican Era's Press: Exploring and Reflection of Cheng She-Wo

Shun-Shing Huang *

## ABSTRACT

While media monopolization has become a serious topic among the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media development, it is erroneous to label it as a new phenomenon: concerns regarding press trust and the issue of monopoly have emerged in America, Britain and China as early as the 1930s. Since the advent of monopolistic capitalism, the trend of commodification has disseminated extensively throughout our daily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Constant application of the latest technology in the organize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of communication has exacerbated the monopolization and commodification of media. In other words, monopoly is an inevitable stag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of commodification, yet why and how we got to this part of history tend to be left out of the big picture in past discussions. This study is an attempt to shed light on the potential alternatives in the exploration of media monopolization. It analyzes Cheng She-Wo's observation and critique of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press at the time, which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eng She-Wo's journalism development project as his answer to the capitalize and publicization dilemma faced by modern press.

---

* Shun-Shing Huang is Assistant Researcher at the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in Shih-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e-mail: t197266@ms4.hinet.net.

**Keywords:** Cheng She-Wo, media monopoly, publicization, republican era's press